



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

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
疑，待人要在有疑處
不疑

胡適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

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

耿云志 闻黎明 编

大胆的假设

小心的求证

通一

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(京)新登字007号

责任编辑：陈汉孝

封面设计：小 朋

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

XIANDAI XUESHUSHISHANG DE HUSHI

耿云志 闻黎明 编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2.75印张 308,000字

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30,001—106,000

定价14.00元

ISBN7-108-00585-9/K·96

序

王子野

人所共知，胡适与陈独秀以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而齐名。提到戊戌维新运动，人们总不能不提康有为和梁启超。同样，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，人们也不能不提胡适和陈独秀。想当年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名字曾倾倒过多少青年学子。

1917年1月，胡适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发表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。这号声象春雷一样，震动全国。他以提倡白话文为新文化运动立下头功，从此胡适声誉鹊起。接着他又提倡新诗，出版了第一部新诗集《尝试集》，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作品。同时他考证《水浒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儒林外史》，把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提高到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。特别是胡适的《红楼梦》考证使他成为“新红学派”的开创人。在哲学方面，他提倡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，他把研究成果写成了使人耳目一新的第一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。总之，胡适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开拓工作是多方面的。

谁也不能否认，胡适是近、现代我国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者之一。可惜在学术文化上这样一位巨人，由于深受美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，迷醉美国的民主政治，对马克思主义始终采取敌视态度。

但对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，不做全面分析研究，不把政治和学术分开而采取简单粗暴的否定一切的态度是不正确的。

胡适诞生到今年恰恰一百年，他逝世也已廿九年。他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，对他的功过是非一直有争论，而且一时也难以作出定论。过去，人们对他只着意于政治批判，对他有深远影响的学术思想还很少研究。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实事求是的学风得到恢复，胡适学术思想的研究也提上了日程，这是好现象。已经开始的工作有待于继续深入。

这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发起，由十二个单位合办的首次胡适学术讨论会于1991年11月7日至10日在胡适的故乡安徽绩溪县举行。有来自京、津、沪、皖等十一省市的有关专家学者近五十人参加讨论。与会代表提交论文三十多篇。会上发言热烈踊跃，接触问题很广，重要的有：（1）胡适对新文学运动的功绩；（2）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；（3）胡适与徽州文化；（4）对胡适“整理国故”的评价；（5）胡适在小说考证方面的成就；（6）对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历史地位的评估；（7）胡适对墨学研究的成果；（8）胡适重审《水经注》公案的意义；（9）胡适与梁漱溟的中西文化问题的探讨；（10）关于“名教”与胡适思想的关系；（11）胡适与“科学玄学论战”；（12）胡适与传统国文教育的改革；（13）胡适的文化哲学及其评价；（14）关于胡适思想的核心；等等。

在讨论中有些问题取得了共识，但意见分歧也在所不免。不管意见看法如何，所有发言者都能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，力求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肯定应当肯定的成就，同时也毫无隐讳地指出应当指出的缺点和失误。

这部论文集，是这次会议的成果。虽然每篇论文水平高下不一，意见也不一定都是成熟的，但都能言之有物，立论有据，各具新意，值得一读。

目 录

序	王子野 (1)
胡著《说儒》与郭著《驳说儒》平议	邓广铭 (1)
胡适与墨学	杜薰民 (10)
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与中国现代学术	王法周 (28)
胡适的中古思想史研究述评	楼宇烈 (45)
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	欧阳哲生 (60)
胡适与徽州文化	颜 非 (78)
胡适：徽州历史上的第三个文化伟人——试析	
胡适与徽州文化	唐力行 (96)
胡适整理国故平议	耿云志 (110)
胡适重审“《水经注》公案”浅议	方利山 (127)
胡适与近代中国传记史学	朱文华 (141)
谈谈胡适的文化哲学倾向	闻继宁 (158)
反“名教”与胡适思想	尹权宇 (172)
胡适与杜威哲学的跨文化传播	程伟礼 (185)
论胡适的科学人生观	胡 明 (200)
胡适“科学的人生观”的得与失	黄克剑、吴小龙 (215)
胡适自然主义人生观的哲学倾向(大纲)	王小其 (229)
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——论五四时期胡适与梁漱	
溟的东西文化之争	郑大华 (233)
胡适的新文学史观(大纲)	曹伯言 (244)

DJ83/21

胡适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	宋剑华 (253)
评胡适的小说考证	易竹贤 (261)
《文学改良刍议》的历史考察	沈卫威 (280)
胡适由少年诗人到新诗鼻祖	沈 寂 (297)
胡适与中国近代目录学	季维龙、宋路霞 (313)
胡适与传统国文教育改革	吴二持 (324)
胡适与北京大学	黄艾仁 (332)
鲁迅与胡适：从同一战阵到不同营垒	陈漱渝 (347)
试论陈胡梁思想分歧的文化底蕴	马 勇 (364)
附录：胡适研究论著要目	闻黎明 (378)
后记	编 者 (402)

胡著《说儒》与郭著 《驳说儒》平议

邓广铭

胡适先生于1934年发表了一篇《说儒》，是在他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（上卷）》的基础上，又结合了一些新的资料，新的见解，而写成的一篇专题论文。因为这是把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讲述儒家的部分加以改造和提高的，所以文章的局面广阔，见解比较开朗、新颖，成为当时很受学术界重视的一篇论著。到抗日战争前夕，即1937年5月，郭沫若先生当时还在日本，针对着《说儒》，写了一篇《借问胡适》，即后来改题为《驳说儒》那一篇。在抗日战争初期，胡先生即受蒋介石之托到欧美去从事民间外交活动，后即出任驻美大使，到1946年7月才又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。直到1949年胡先生离大陆去台湾之日为止，他大概一直未看到郭氏的驳文，所以也没有答辩文章。我现在只想以门外汉（因为我从来不曾研究过先秦的学术史和思想史）和旁观者的立场，对两文作一番平实的评论^①。

一、说儒的几个主要论点

（一）殷的贵族所信奉的是祖先教，祭先公先王的礼很隆重。殷人还相信占卜，每逢出兵征伐或举行大礼仪，必先进行占卜，到后来也兼用筮法算卦。因而社会上便应此需要而产生了一批一批

的具有这类专门知识、技能的祝、宗、卜、史等等。周之灭殷，是以一个文化水平较低的民族而征服了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，所以还得“周因于殷礼”，每次行礼，都还得用“殷士”作相礼的人。（《诗·大雅·文王在上》篇所说的：“殷士肤敏，裸将于京，厥作裸将，常服黼黻”，）就是描绘“殷士”穿戴着传承已久的衣冠，而助周的贵族行礼，等于后代西晋灭亡后被俘虏的皇帝的青衣行酒，既要忍辱，还要表现得积极，于是这班殷士便只能以柔道自处。儒的古训为柔，这班奉行柔道的殷士遂也逐渐被称为儒。《周易·需卦》所描述的一些动作，实际上就是“儒”的动作。还引用《左传》所载宋国三朝元老正考父的“三命兹益恭”和他鼎上的铭词为例，证明孔子的先人早就是奉行柔道的。

（二）正如《以赛亚书》所载希伯来人亡国后，在犹太民族中流行着预言（悬记），说以后必有复兴民族国家的圣人出现，后来果然出了一个耶稣，殷亡之后，殷民族中也出现了一首“天命玄鸟”的预言诗，说“武丁孙子”中，必会出现一个战无不胜的“武王”，能够“肇域彼四海”。同时还流行着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的预言。在宋襄公要使此预言成为现实而失败之后，东方诸国的民间，甚至包括鲁的贵族臧孙纥、孟懿子诸人，遂都寄其希望于孔丘身上，认为圣人之后必有达人，其将在孔丘乎。而孔丘也经常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殷人，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，经常跃跃欲试，要学周公。要在东方重建一个周。最终虽抱着“天下其孰能宗予”的遗憾死去，而经他改造过的“仁以为己任”、“士在可以不弘毅”的新儒家学派却“声名洋溢乎中国”。在宗教上、学术上实现了那一预言。

（三）胡著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（上卷）中，本以为“三年之丧”是儒家所创，并非古礼，并举《墨子·非儒篇》中的话、《论语》记宰我反对三年之丧的话和《孟子》中滕人反对三年之丧的话为证。但《说儒》改变了这一说法，专引用《论语》中孔子回答子张问“高宗谅

阴，三年不言，何谓也”的一段话，断言三年之丧乃是本诸殷人的传统礼俗，并对过去一直无法解释清楚的“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”一句话也作出了解释②。

二、《驳说儒》一文中的几个主要论点

(一)三年丧制是儒家的特征，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中的旧说原本不误。根据《殷墟书契》前编所载甲骨卜辞，可以查知殷王（帝乙）二祀、三祀都有自行贞卜、自行主祭的记载，怎么能说“君子三年不为礼”、“三年不为乐”和“三年不言”呢。

(二)对谅阴的新解释：阴即暗，口不能言为暗；“谅”为真正。此与“宅忧”、“倚庐”全无关。武丁时的卜辞“每多‘今夕王言’，或‘今夕王乃言’，往时不明其意者，今已涣然冰释”。

(三)《易》的卦爻辞乃楚人馯背子弓（《荀子·非十二子篇》称之为孔子以后唯一的圣人）所作，孔子死后才出现。孔子与《周易》无任何关系。《需》卦既系后出，当非描绘最初期“儒”的形象和举动。

(四)《左传》昭公七年所载《正考父鼎铭》乃系西汉末年刘歆所伪造，“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的关于正考父的那一段，明明也是经过刘歆窜改的。”那文字的前半是剽窃《庄子·列御寇篇》的一节，后半则是摹仿《檀弓》（下）所载张老所说的“美哉轮焉，美哉奂焉！歌于斯，哭于斯，聚国族于斯”那几句话而构成的。

(五)《诗·商颂·玄鸟》并非预言诗，其中为过去人都解释不通的几句，应改为如下的分节和断句：

商之先后，受命不殆，在武丁孙子，武丁孙子。（之部）

武王靡不胜，龙旗十乘，大糒是承。（蒸部）

“武王”就是上面“古帝命武汤，正域彼四方”句中的“武汤”。

(六)“中国文化导源于殷人……春秋时代……接着便有一个灿烂的文化期开花，而儒开其先。这是正确的史实。这种见解我在十年前早就提倡着，而且不断地在证明着。《说儒》的出发点本就在这儿，虽然胡适对于我没有片言只字的提及。但是从此儿机械式的抽绎出这样一个观念：儒是殷民族的奴性的宗教，得到孔子这位大圣人才把它‘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’，更从而牵强附会地去找寻些莫须有的根据；这却不敢说是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’的。”——这段话，等于说，凡是《说儒》中正确的地方，都是从郭氏的文章中抄袭来的；凡非从郭文中抄袭来的，全都是不正确的。

三、我对于胡郭两文的持平之论

因为郭沫若先生在《驳说儒》中所提出的问题眉目清楚，我在此，也就以《驳说儒》一文的顺序为顺序，对两文进行平议。

(一)三年丧制为儒家所创立、所提倡，这本是在《说儒》一文发表之前，为中国学人所公认的。只有汪中在《述学》一书中曾提出过“三年之丧为殷制”之说。胡先生在写作《说儒》之前，并没有看到汪中之说，而是看到了傅斯年先生的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一文，同意傅文所说齐鲁宋卫等东方诸国，原皆殷商故土，故除统治阶级奉行周礼外，其民间则仍奉行殷之故俗，其中包括三年之丧。认为以此为据，即可以把孔子所说“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”的话讲通了，于是‘把孔子答子张所问“高宗谅阴，三年不言”的那段话，引作最强有力的证据，论证三年之丧乃殷人传统的丧制。郭氏从甲骨卜辞中找出了殷王帝乙于即位后的第二年、第三年皆亲自主祭、亲自贞卜的记载，证明“君薨，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”之说是不能成

立的。我认为，我们必须承认，郭氏此说，是证据确凿，辨析极为精辟的。

然而，我们在此还必须弄清楚，被郭氏所驳倒的，乃是孔夫子，而非胡博士。因为，孔子本即是根据他对“谅阴”和“三年不言”的那种错误理解而建立了“儒”的学说中的核心之一，他并且十分自信地为三年丧制提出理论根据：“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”，任何人都曾获得“三年之爱于其父母”。经他大力宣传之后，到孟子，到后代儒生，无不力主奉行此种丧制。所以，胡先生把影响了中国上层社会两千多年的这一理论作为《说儒》的内容之一，是没有犯什么错误的。

(二)郭氏对“谅阴”所作的新解释，他既在武丁时期的甲骨文中找到了“今夕王言”、“今夕王乃言”，我认为也是可以接受的^⑧。

(三)《说儒》部分地采用了章太炎的《原儒》中的论点，对《易·需卦》的卦爻辞解释为状述“儒”的“柔”道行动，郭氏则以为《周易》的成书不会在孔子以前，孔子不曾得见《周易》，《周易》乃战国初期楚人驺背子弓所作。其立说的根据则是因《益》卦中两见“中行告公”字样，《泰》、《复》、《夬》诸卦也有“中行”出现，他断言此“中行”必即指晋的中行氏荀林父而言。我以为这个断语纯属武断。因为，《周易》是一部筮书，是巫史（算卦专业者）根据某卦某爻的象数以断吉凶的一些零星记录，有些关系到可以广泛适用的记录便成为保留项目，到了某个时期（当然不会只是“殷之末世、周之盛德之时”，不会只是“文王与纣之事”），有人把记录在某卦某爻下的辞句，加以补充与编订而成书的。所以，《周易》的卦爻词，既非一个时期所写定，更非出于一人之手。甚至在成为定本之前，在社会上已经流行着一些写本，其中的卦爻辞也并不固定，有被随时抽换的可能。试看，卦爻辞中所涉及的事件，既有殷商先祖王亥丧羊于易、丧牛于易的故事（《大壮》、《旅》），有“高宗伐鬼方，三年克之”

《既济》)和“帝乙归妹”于文王(《泰》)、“箕子之明夷”(《明夷》),也有涉及西周的记录,时间跨度很长,不但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,而且,也不可能是出于同一时期的众人之手。把“中行”即指定为春秋后期晋国的中行氏荀林父,只属于郭氏的一家之言,还未为学术界所公认,据此而即断言《周易》成书在孔子身后,为孔子所不及见,是极缺乏说服力的④。

(四)对于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所载正考父的鼎铭,郭先生都以为是出于刘歆的伪造,这是牵涉到从西汉以来的经学上今古文两派的问题。今古文的经学之争,开始于西汉哀帝建平元年(公元前6年)刘歆之请建立左氏春秋、毛诗、逸礼、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。当时已列学官的今文经生谓歆“改乱旧章,非毁先帝所立”,哀帝则谓“歆意欲广道术”,“何以为非毁?”所请虽未得遂,然自此迄于东汉,不但无人谓古文经为刘歆伪造,东汉的许多著名学者且皆习古文经,并未出现今古文互相抵排之事。又,建平元年王莽因得罪哀帝的祖母及其母,罢大司马,赋闲家居,与刘歆之请立古文经并无关联。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,今文学家的议论风靡一世,他们认为,出现于西汉晚期的古文经典全都是刘歆伪造的,而其伪造的目的,则是为助王莽篡汉。到1930年,钱穆先生在《燕京学报》上发表了《刘向刘歆父子年谱》,考定了刘歆校中秘书的年代及其建议把诸古文经立于学官的时间,并考定了那时候的王莽正因罪罢官,刘歆绝对不可能预测到他有篡汉的可能;以刘歆校中秘书的时间计量,他也决不可能伪造偌大数量的古文经典(遍伪群经)。而且,在刘歆作此建议之前,他所提及的古文经,早已各都有其专力攻治的名家了。于是而今文家所制造的迷雾被一举廓清。胡适先生前此本也是相信今文家之说的,读了钱先生的文章之后,见解大有改变。郭沫若先生把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两书对正考父鼎铭的记载认为皆出刘歆之手,而且指实铭词乃系摹拟《檀弓》(下)张老的话作成

的，且以为鼎不能用于煮粥，这番议论，只不过表明了郭先生所受今文家的毒害甚深，而且专门咬文嚼字，不免“以文害辞，以辞害志”^⑤。

（五）《商颂》中之《天命玄鸟》篇，郭氏断言其并非预言诗，我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。因为，胡先生把“武丁孙子”句下的“武王”，说作“悬想人物”确实有些牵强；而把“大糗”改为“大难（艰）”也实在毫无根据。今按，《商颂》的写作时代及其作者，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，但商人自称其国都为商不为殷，而《商颂》中殷商错出；卜辞称汤为太乙不称汤，而《商颂》则称汤、成汤、武汤或武王；知其非殷商时人所作。西周时人均不称荆蛮为楚，而《商颂》则有“挾彼殷武，奋伐荆楚”句，知其非西周时人所作。据此，则《商颂》必周东迁后之作品，作于宋人。但其所颂对象则为汤及武丁等殷商诸王，其人、地名称之与商代或西周人之称呼不同，即是因写作者所处时代致然。据此说来，则知古文中的毛诗之说固不可信，今文中的韩诗之说，也同样是不可尽信的。然如郭氏之必依韩诗之说，指实《商颂》为正考父所作，那就必然也要连带地承认韩诗所言“《商颂》章句亦美[宋]襄公”之说，然而《商颂》诸诗实无一首符合春秋时宋襄公为宋君时之情况者，特别是其中的“昔有成汤，自彼氐羌，莫敢不来享，莫敢不来王，曰商是常”诸语，怎能是反映宋襄公时的宋国呢？郭氏偏要以《商颂》“格调雄壮，音韵洪朗”来反证正考父绝非“三命兹益恭”的那种懦弱谦逊人物，岂不牵强得太过分了吗！至于他把毛诗序及《国语·鲁语》中正考父得《商颂》于周太师之说加以否定，以为那“同是经过刘歆玩过把戏的东西”，这就更是因为没有受过“钱说”的洗礼而做的无稽之谈了。更何况，郭氏把“在武丁孙子，武丁孙子”标点为连缀句，而把“武王靡不胜”作为另一节的首句，姑不论在《雅》、《颂》中并无这种文句结构格式，即令承认这一标点办法不误，而郭氏既相信韩诗，则这其中的“武丁孙子”也还

是要落实到宋襄公身上。《说儒》把宋襄公等人认为符合《玄鸟》诗“悬记”的人物，《驳说儒》则把《玄鸟》诗作为赞美宋襄公的诗篇，这岂不是殊途而同归了吗？如此则郭之与胡是其失唯均的。

（六）若以为《说儒》的出发点是袭用郭氏的成说而加以抄撮发挥的，我却敢于斩钉截铁地断言其为诬辞。一则如我在上文所说，《说儒》乃是在胡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基础上，因又陆续受到了章太炎《原儒》、基督教的《圣经》（《以赛亚书》）、特别是傅斯年先生的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诸著作的启发而写成的；二则据我所知，胡先生对郭先生的文章是不甚重视的，郭文经他过目的极少极少，何能受其影响呢？

四、几句结束语

（一）胡先生总是主张“拿证据来”和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”的，但《说儒》却并不是在这一原则下写成的。他所用作证据的，有很多都是经过他加以委婉疏解之后才使用的，既不够直截了当，其说服力自然就不够坚强了。

（二）胡先生的《说儒》，对先秦典籍中的有关记载，穷搜博采，又结合现代人的一些创见（可惜并不包括郭先生的创见），融会贯通，自是一篇大块文章。郭先生虽指出其中三年之丧为殷制之说与殷的史实不符，但被他所驳倒的乃是孔子的言论，并且是孔子据以建立儒家学派的重要主张之一，《说儒》据此进行阐述是正确的。郭的驳难，并不能降低《说儒》的声价。

（三）三年之丧为孔孟所极力提倡（《孟子·万章篇（上）》竟断言舜禹之时已实行三年丧制），历代学者将信将疑，至《说儒》则断然接受而不疑。郭沫若先生从甲骨文中找到王二祀、王三祀亲自

主祭、贞卜的记载，使殷人行三年丧制之说被彻底否定。这实在是郭氏《驳说儒》一文的绝大贡献。所以，他的此文并不因没有驳倒《说儒》而失去其理应享有的声价。

于是乎我要说，《说儒》与《驳说儒》两文虽各有瑕疵可指，然而两文以其各有创见创获，它们是各有千秋的。

注 释：

① 冯友兰先生的《原儒墨》一文中也对《说儒》有所驳诘，但他所提问题不似郭文之突出，故没有引发我作《平议》的想法。

② 全用傅斯年先生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文中之说。我以为，胡先生主要是受了此文的启发才写了《说儒》的。

③ 董作宾在 1942 年也写了一篇《从高宗谅阴说到武丁父子的健康》一文，说卜辞中还有武丁两次卜舌疾的记载，失言症也可能是舌疾引起的。为郭说所补充。

④ 郭氏的《周易的制作年代》虽作于《驳说儒》之前，但其立说之悍也是惊人的。

⑤ 杜预在《春秋经传集解·后序》中说，他所见新出土的汲冢《竹书》所载史事多与《左传》“符同”，而异于公羊、穀梁，断言此二书乃近世穿凿，非《春秋》本意。杜预的话不正可证明《左传》非刘歆所伪造吗？

胡适与墨学

杜蒸民

墨学，是胡适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是先秦诸子中，取得最引人注目的开创性成果的课题。他的成果，在当时，就受到过第一流学者如蔡元培、梁启超、章太炎、章士钊等的肯定和批评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。近年来，一些学者对他的墨学的具体论断进行过评论，但对他的墨学作全面、系统的专题评论则未见到。因此，对他的墨学成果作一次比较系统的专门探讨，实有必要。

一

墨学，在战国时代，是与儒学并称的“显学”。但到汉武帝定儒学于“一尊”时，墨学已成为“绝学”。以至《史记》仅以：“墨翟宋之大夫，善守御，为节用，或：‘并孔子时’；或曰：‘在其后’”二十四字记其生平事迹。

二千年来，对于墨子和墨学，封建学者大都视为儒家的敌对学派，重复孟子“无父”、“禽兽”的指责。至于墨子及其学派的一生事迹，《墨子》的思想内容，则几乎无人问津。西晋时，鲁胜作《墨辩注》，但只留一个《序》^①，就“经”与“说”进行过搭配和疏解。唐代，韩愈看到“儒墨同是尧舜，同非桀纣”^②，企图调和儒墨关系。但因基本立场是尊儒，故也未能改变“扬儒抑墨”的思维定势。墨学始